

摘要: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备受社会各界的重视。人力资源建设如何为乡村振兴助力,保障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是值得进行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流失、人才留存率低、人力资源数字化进程缓慢等问题亟待解决。本文作为研究项目的初步探索阶段,着重整理了文献综述并且对总体研究的框架进行了设计,旨在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家层面关于“乡村振兴”的政策内容,然后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和动态。通过理论构建提出了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在乡村振兴实践、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方面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路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促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被提出。2023年2月13日,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被提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科技人才和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依托农村人才队伍的壮大与配套服务体系的构建。在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中,构建全面、高效、智能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乡村振兴中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建设离不开科技人才的加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如何融入乡村振兴建设中是值得研究的课题。针对这一复杂而重要的课题,需要采用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对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具体来说,采用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深入调研当前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结合政策要求与技术发展水平提出一整套针对性的优化方案,助力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升级与优化。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态

首先对我们国家现有的农村人力资源相关研究进行大致的梳理。关于本项目的选题,目前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初探

■ 雷石磊

国内学术界有一定的文献基础。随着乡村振兴政策的逐步实施,与之相应的研究也不断地深入与聚焦,为从乡村振兴的视域下优化农村人力资源服务路径提供了一定的学理基础。

曹锐和钱海婷认为农村人力资源管理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由于各地区就业市场和人才市场参差不齐,给农村人力资源有效就业和接受再教育带来了较大困难^①。张瑞芝认为目前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标准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服务指标缺陷和缺乏理论支持等问题^②。汪双根认为农村人力资源质量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需要^③。

如何实现乡村的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关注的现实问题。国外学术界关于本国的乡村发展对本项目有积极的参考价值,与本文有较强的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平松守彦提到:振兴乡村的农林业,还需要大力发展乡村工商业^④。Gladwin提出乡村创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⑤。Ojo & Hairul 提到:西方国家的乡村振兴主要是针对乡村衰退现象展开的^⑥。

从上述研究动态以及相关研究文献来看,已有多项研究可以为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提供参考和借鉴,可以继续深入地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部分文献涉及企业、金融、就业等几类主体,对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缺少深入的探讨。其次,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的部分文献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实地的调研;最后,本课题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研究方法交叉的研究,科研成果对于其他相关的研究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基于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对于该项研究需要调研和探讨的方面有:目前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现状是如何的?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在乡村振兴中起到什么作用?如何优化目前的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探索前沿科技与农村人力资源建设领域的结合点。

二、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1.学术价值:(1)贯彻落实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2)进展顺利的话,后续研究预计需要依托于各地的人力资源产业园与相关机构,基于科学严谨的调研结果进行分析。

2.应用价值:(1)研究的成果会提供目前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决策支撑,辅助农村企业获得更好发展,帮助解决农村的就业和人才引进问题。(2)针对目前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现状,通过详细的调研提出优化路径措施,预期研究结果能够为相关企业决策和战略规划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

三、研究的框架设计

1.研究对象

从总体上来说,研究对象为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在研究的过程中,具体对象会涉及六个方面:(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标准化的实施。(2)农村人力资源服务的方向和内容。(3)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现状。(4)数字化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向与应用。(5)农村人才的评定标准。(6)人工智能在农村人力资源服务的方向。

2.研究的框架

首先,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基本内容与发展历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内容涉及三个重要方面,分别是:我国的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现状、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的数量规模和类型、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措施与成效。在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发展过程与变迁中,研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出现与探索阶段、形成与壮大阶段、深化改革与继续发展阶段。

第二,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成效与现状调研。这部分首先会涉及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政策解读和落实。然后是调研和数据收集与处理,一方面需要依托各地的人力资源产业园数据信息,另一方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主要调查目标是我国农村人

力资源服务体系的运行状况与成效。调查收集的访谈内容和数据作为后续研究的数据来源,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简单分析。

第三,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的逻辑思路。主要涉及“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和定位”和“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逻辑”两个方面。

第四,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模式。基于调研和理论分析结果,阐述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的基本模式。

第五: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的前景。

3.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和目标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1)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现状调研。(2)从乡村振兴的视域,如何对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进行路径优化。(3)对于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内容和范围的界定。(4)如何从乡村振兴的视域,对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进行定位,明确路径优化的措施。

本课题主要研究目标:(1)阐述我国目前农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标准化的实施效果。(2)调研目前该服务体系的运行现状与升级需求;(3)明确并评估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逻辑思路。

四、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1)在学术思想方面:研究视角的实践性。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对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研究中,部分研究没有经过实地的深入调研,从研究视角来看本研究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实践性,多位专家预测,未来是人工智能的竞争与革命,面对这个时代机遇,作为科研人员,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投身于我国需要的科研领域和项目,帮助我国实现核心技术的长足发展,本研究探索人工智能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预计会有一个具有实用性质的优异科研成果。

(2)学术观点方面:从政策研究出发,本课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对研究进行深入剖

析。本课题提出的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优化路径,是基于现阶段农村人力资源服务详细调研的基础,提出的对策更具针对性和可实施性。

(3)研究方法方面。本课题后续研究要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交叉融合,包括:案例研究法、问卷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探讨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具有一定的方法创新性。另外,本研究会用到普查数据、统计数据、抽样调查数据,强化研究的数据基础,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五、总结

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从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领域,探索我国农村人力资源服务体系的优化路径,是一项长期的科研工作。在调研的过程中需要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对于问卷的设计要注意科学、合理、简洁,对于问卷题目的设计要简单易懂。科研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收集的数据要仔细分类整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总之,本文提出了一个研究的框架,后续相关的科研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和借鉴之用。

参考文献:

- [1]曹锐 & 钱海婷.新型城镇化发展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农业经济, 2020(03):65-67.
 - [2]张瑞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标准化思考.经济管理文摘, 2021(23):124-125.
 - [3]汪双根.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研究.山西农业, 2022(15):129-131.
 - [3]日平松守彦著.王湖泽,一村一品运动[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2-7,117-124.
 - [4]Gladwin C H,Long B F,Babb E M, et al.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89,71(5):1305-1314.
 - [5]Ojo K A,Hairul B N I.Host's supports for Volunturism: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J].Australian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2013,7(4):393-402.
-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反文化殖民视域内的香港青年身份认同路径研究

■ 陈佳 李宗灿

当前,香港青年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正处于积极的构建阶段,但也存在着部分香港青年对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历史的了解不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深,以及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和解读带有偏见。形成这种偏差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社会以及教育四个方面。因此,第一,必须实行教育改革,坚决实施反文化殖民教育;第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第三,强化全方位参与度,拓宽青年深入了解国家的渠道。

香港这座全球知名的国际大都市,因其独特的历史轨迹与地理位置而呈现出了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多元性,这在反文化殖民的视角下,为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构建提出了独特的挑战。从1842年起被英国统治,再到1997年回归中国,香港的这一历史转变在其青年一代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们的身份认同在本土文化与国家认同之间游走,形成了复杂的心理景观。反文化殖民这一议题,不仅关乎对历史与文化的再认识,也涉及对政治、社会和教育的深层次探讨。青年是社会的未来,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远发展。近年来,香港青年在面对全球化、本土文化以及外来影响时,对身份认同的探索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国民教育风波”“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等重大热点事件,将香港青年一代身份认同薄弱问题推上社会风口浪尖。本文旨在深入探索香港青年在反文化殖民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形成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反文化殖民教育的理论框架

文化殖民通常指的是一个更强大、更发达的文化力量对较弱文化群体的渗透和支配,这个过程涉及价值观、语言、艺术、习俗和信仰的传播与同化。在历史长河中,殖民者通过教育、媒体和政策等手段,将自身的文化强加于殖民地,导致殖民地文化的边缘化和本土文化的消解。对于香港而言,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西方文化通过教育制度、媒体和日常生活方式等途径深入渗透,塑造了一种融合中西的“香港文化”,但也导致了部分香港青年对本土文化的模糊和对身份认同的迷茫。文化殖民的影响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它可能导致文化身份的混乱,使个体在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徘徊,难以确定自我归属。在香港,这尤其体现在一部分青年对“香港人”身份的强烈认同,而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相对薄弱。其次,文化殖民可能导致对本土历史和文化的忽视,使青年人对国家历史的了解有限,难以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再者,外来文化的过度影响可能弱化社区的凝聚力,加剧社会内部的分歧,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反文化殖民教育旨在挑战这种文化同化,恢复和强化本土文化的价值,同时促进对身份认同的深度理解和接纳。这要求教育体系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青年人的文化自觉和批判性思维,使们能够对各种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从而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建立坚实的国家认同基础。反文化殖民教育的内涵包含了对于本土文化的尊重、保护和传承,以及对全球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它的核心是培养青年人的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够识别和抵制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同时积极挖掘和弘扬本土文化的价值。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不仅仅是传递知识的桥梁,更是塑造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反文化殖民教育能够给香港青年提供一套全面的文化教育框架,帮助他们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保持坚定而全面的国家认同。这不仅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也是对青年未来发展的大力支持,对于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统一具有深远意义。

二、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的基本情况

香港青年对身份认同的认知现状呈现出复杂性、动态性。在反文化殖民的背景下,他们的

认知既受到历史背景、文化交融、社会环境以及教育环境的深刻影响,又在不断地自我反思和外部引导中演变。

一方面,许多香港青年在积极寻求国家认同的构建。他们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学习本土历史与国家历史、接收多元文化,逐渐深化对国家认同的理解。例如,通过观看反映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电影、阅读相关文献,他们能更深入地理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同时,部分青年在社交媒体和公共论坛上主动进行讨论,试图理解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对国家认同的内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某些社会事件的发生,如2019年的示威活动,许多香港青年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身份认同。虽然这些事件引发了分歧和冲突,但也促使一部分青年深入思考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探索个人与国家的和谐关系。这种认知的变化反映了青年群体在面对挑战时的反思能力和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部分香港青年对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历史的了解不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不深,以及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和解读带有偏见。据2022年香港研究协会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市民中,18-29岁的年轻人仅占比9.6%大部分18-29岁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国人。一些学者也指出,“香港青年国年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于文化认同强于政治认同,地域认同削弱国家认同以及民主认识误区影响国家认同。”还有学者强调香港青年身份认同背后潜藏的是政治价值观异于中国主流政治形态。

2.影响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困境的因素

在反文化殖民的语境下,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困境显得尤为突出。这种困境源于历史、文化、社会和教育等多方面的交织影响,导致他们在“香港人”与“中国人”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中遭遇挑战。

在历史层面上,历史因素对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殖民历史塑造了独特的“香港人”身份,这一身份认同往往与中西文化的融合相联系,但同时也可能与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冲突。当青年们试图在历史的脉络中寻找自我定位时,他们可能会对殖民时期的历史记忆产生矛盾的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理解和接受。第二,在文化层面上,香港的中西文化交融为青年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视角,但同时也使他们在身份认同上面临选择。他们既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深受本土文化熏陶,这种文化碰撞可能导致他们在国家认同上感到迷茫。例如,一些青年更倾向于接受外来文化,而对本土文化和国家认同持保留态度,这种文化认同的分裂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本土文化与国家文化的矛盾态度。第三,在社会层面上,香港本土仍然残留着港英政府时代殖民的“遗毒”,他们甚至的痕迹至今仍然难以得到有效地消除。例如,有学者统计,以英国女王及王室成员命名的地名以殖民时代维多利亚女王为代表,维多利亚的名字遍布在港的大街小巷、海港码头、公园山岗、大厦广场、俯拾即是。反观被日本曾经殖民深重的韩国,独立之后却不遗余力地去除殖民的痕迹,这令他们难以得到有效地消除。例如,有学者统计,以英国女王及王室成员命名的地名以殖民时代维多利亚女王为代表,维多利亚的名字遍布在港的大街小巷、海港码头、公园山岗、大厦广场、俯拾即是。反观被日本曾经殖民深重的韩国,独立之后却不遗余力地去除殖民的痕迹,这令他们难以得到有效地消除。

第四,在教育层面上,香港当前的教育环境在某些方面仍然是薄弱的。教育是塑造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虽然香港回归后在教育政策上有所调整,但仍有声音指出,教育体系中的殖民遗留问题可能影响青年人对国家历史和文化的正确认识。课程内容可能过于强调西方视角,而对本土历史和文化教育不足,这会误导香港青年对国家认同的疏离感。例如,2020年5月1日,香港某小学教师授课时公然叫嚣“英国

为消灭鸦片发动战争”,同年的5月14日,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惊现“1900-19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的立场歪曲、倾向性极强的美化日本侵略史的试题。

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困境显而易见。他们面临如何在尊重本土文化与认同国家文化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追求个性化与承担公民责任之间做出选择,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实现自我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存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是个体心理层面的挑战,也是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难题,需要通过教育改革、文化传承和社会对话等多种策略来解决。

三、香港青年的身份认同形成路径探究

根据前文分析,促进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形成路径并非无迹可寻。从历史、文化、政治、教育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综合出发,可以探究出以下路径:

第一,实行教育改革,坚决实施反文化殖民教育。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不仅要增加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內容,确保学生能够系统地学习到关于中国历史、中华文化传统、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还要根除西方错误思想,循序渐进地减少西方的相关内容。在学校的师资队伍上,要严格要求教师的政治立场,确保他们能够准确、全面地传授相关知识。在教学资源上,要重视教材建设,认真审核教材内容,阻止“独”教材流入校园。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媒体、网络资源等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生动有趣的材料,帮助学生更直观更全面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例如,当前香港青年体验“红色旅游”比较少,红色文化考察的吸引力对于香港青年来说还比较低,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加强力量。

第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首先要保证媒体从业者的质量,为媒体工作者提供关于国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敏感性和理解力。然后应加强媒体监管,要求媒体遵循专业标准和道德规范、重视社会责任,尽量确保媒体不传播错误信息或煽动性内容。此外,要加强网民思想引导,鼓励创作或传播关于中华文化、民族团结的优秀文艺作品等,传播国家的正面形象,减少误解和偏见。

第三,强化全方位参与度,拓宽青年深入了解国家的渠道。一是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让香港青年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增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二是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在内地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通过实习、就业等方式,让他们直接参与国家的发展,增强对国家的了解与信任。三是为香港青年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历史、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可能让他们面临着身份的迷茫,这能帮助他们处理因社会变革和个人成长带来的困惑和压力,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通过上述措施,香港的教育系统、媒体环境和社会风气能够得到净化,香港青年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珍视自己的中华文化根源,从而促进身份认同的形成。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历史背景、文化影响、教育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深入分析,揭示了香港青年在反文化殖民语境下的国家认同形成路径。构建更坚实的国家认同感,实现香港青年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的和谐共融,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社会环境的营造、教育的落实以及与中国大陆的深入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议题的深入探讨和实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下一步,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在香港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度,这样才能真正地构建香港的社会和维护好国家的统一。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自筹课题“提升香港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观的‘物律’路径研究”(编号:XSP2023FXC101)。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青少年岁月:丁玲革命意识萌芽的催化剂

■ 梁义文

摘要:丁玲的革命意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童年时期经历的不断积累和思考中逐渐形成的。她出生在封建家庭的背景下,亲眼目睹了封建阶级的压迫,深刻体会到女性地位的卑微,这些经历逐渐孕育了她反抗旧社会、追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在母亲开明思想的熏陶下,丁玲培养了不向淫威屈服的人格,她的内心开始萌发出对革命道路的向往,格局视野也由此开阔;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她从自己狭小的精神世界中解放出来,坚定了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决心,决心踏上一条充满挑战与探索的革命之路。

关键词:青少年时期;革命意识;丁玲;催化

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奠定了其日后思想发展的基础……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丁玲童年时期的经历,包括家庭环境、母亲教育以及参加的“五四”运动,为她革命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影响她命运走向与革命选择的内在因素。

一、压抑的封建家庭:“走向革命的一盆火”

丁玲出生于1904年,她的家庭是湖南临澧世代为官“蒋”姓的豪门贵族,祖父曾做过大官,父亲曾留学日本。然而,在丁玲3岁半时,父亲去世,家产也悉数耗尽,丁玲沦为了贫穷的孤女。无奈之下,丁玲和母亲只能寄居在舅舅家中,也正是在舅舅家里的遭遇,使得丁玲产生了反抗阶级压迫的意识。

由于丁玲女孩的身份,舅舅家人对丁玲不屑一顾,不允许她参与家里任何事务,甚至逼迫她与表哥订婚。在舅舅严格的家规下,丁玲和母亲、弟弟常常只能与家里的奶奶、丫头和长工住在一起。幼年时的丁玲亲眼目睹了舅舅丫头捆在床上脚踏板上打的残暴情景,以及在寒冬腊月里丫头们被迫穿着单薄衣物睡觉的苦难。小小的丁玲内心深处为这些穷苦人感到深深的不平,她半夜把自己小小的孩子悄悄送给她们,和丫头们一起痛哭。也正是这些经历,丁玲对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有了深刻的体会,对阶级压迫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她讨厌舅舅,“我脑子里想,这些人哪,将来是要淘汰掉的,不淘汰是不行的。”^①

不仅是舅舅家,蒋家也让丁玲失望透顶,下定决心与封建家庭彻底决裂。丁玲打算去上海求学时,由于资金不足,只好回到临澧找族人的帮助。原本按照蒋家的规定,凡是蒋家子弟外出求学的,都可以得到祠堂的资助。但这次管事的伯父拒绝了丁玲,认为丁玲是女性,没有权力享受帮助,并拒绝归还丁玲母亲当时变卖家产暂时由他保管的200吊钱。

童年时期,丁玲由于女性的身份而遭受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亲眼目睹的底层人民的艰苦生活的阴暗记忆,让丁玲的心里“燃起了一盆火”,她承认:“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②

二、开明的母亲:“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最好的教育。”

虽然封建家庭带给丁玲的记忆是黑暗的,但好在丁玲有一个十分开明、追求进步的母亲。丈夫去世后,余曼贞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不顾家人的冷嘲热讽,毅然选择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在自己30多岁时选择了新生的道路。她自食其力,选择从事教育事业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女性获得新知识,并在此后的一生都从事着女性解放的工作。母亲如此“出格”的行为对年幼的丁玲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丁玲曾在回忆母亲余曼贞的文章中写道:“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吃苦、勤

奋、努力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③

在性格塑造方面,辛亥革命期间,清兵到处抓捕革命人士,余曼贞不顾个人安危,把向警予和其他革命人士接到家里来往,用自己的性命保护他们。母亲这勇敢、大义的形象在丁玲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使得丁玲日后形成了勇敢果断不向淫威屈服的性格;在人生追求上,余曼贞会给童年时期的丁玲讲许多古今中外忠勇的故事,引导丁玲向这些先辈学习,其中讲秋瑾的故事尤其多。因为有了这些故事的影响,丁玲才能抛开旧社会阴暗的童年中堆集在她幼小心灵的忧郁感伤,对革命的新社会开始产生向往;在格局视野上,余曼贞认为“一个人要为社会做事先得改革这个社会,如何改革这个社会是今天必求的学问”^④,于是支持她转学到新思想活跃的长沙周南女中,一年半以后又同意丁玲奔赴上海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学校求学。余曼贞尽可能地给予丁玲自由,让她在母亲开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三、“五四”运动的冲击:“它震动了我,把我带向前边。”

1918年,丁玲小学毕业来到桃源的一所师范学校上中学,虽然在学校里的生活是自由愉快,但她心中仍然笼罩着一丝乌云,为无法彻底摆脱封建枷锁而忧郁。她朦胧地认识到这样的旧社会不行,但对于社会的出路却仍感到迷茫。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了湘西的这些县城,学校里的部分同学开始去街上讲演、喊口号。最开始丁玲对此感到十分茫然,不明白这些学生在做什么,但她还是跟上了游行队伍。在与这些同学们的接触之中,丁玲对她们关于妇女解放、社会问题的思考深深吸引住了,这些都是丁玲自己百思不得其解想要获得的答案。在“妇女要争取解放”“追求民主自由进步”氛围的影响下,她把自己的辫子剪了,跟着同学们去贫民夜校给贫民教珠算,度过了一段充满激情的时光。

幼时的丁玲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但在“五四”运动后,丁玲内心的反抗精神愈发明显和大胆,她直接剪掉了象征着封建束缚的辫子。回到家中,舅舅舅妈讥笑丁玲“尾巴”给玩掉了,此时的丁玲已经毫不畏惧,直截了当地对舅舅妈说:“你的耳朵为何要穿一个眼?你的脚为何要裹得像个粽子?你那是束缚,我这是解放。”^⑤舅舅和舅妈气得一时语塞。

在对于人生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在“五四”运动之前,丁玲认为自己还只是一个糊涂的小孩子,思想简单,更多的想的是日后如何不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经历了浪潮的洗礼后,丁玲从自己狭小的精神天地中解放出来,在回忆起“五四”运动及这些同学对她的影响时,说到“当时这一群同学是我的指路明灯,她们唤起我对社会的不满,灌输给我许多问号,她们本身虽没有给我以满意的答复,却使我有追求真理的萌芽。”^⑥在这些“问号”的指引下,丁玲在一年半后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奔向了新天地。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后来的丁玲。

参考文献:

- [1]许杨清.宗诚.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6.
 - [2]许杨清.宗诚.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4.
 - [3]丁玲.丁玲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63.
 - [4][6]丁玲.陈明.丁玲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129.
 - [5]蒋祖林.丁玲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33.
-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